



巴金研究

胡永修 周芳芸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I206.7/223

1993

巴金研究

胡永修 周芳芸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研究 / 胡永修, 周芳芸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9 (2008.4 重印)

ISBN 978-7-81016-711-6

I. 巴… II. ①胡…②周… III. 巴金 (1904~2005) — 文学研究 — 高等教育 — 自学考试 — 教材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6324 号

巴 金 研 究

胡永修 周芳芸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责任编辑: 仁 文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30mm×185mm 印张 7.75 字数 165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六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016-711-6
定 价: 1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323; 本社邮购部电话: 028-83208003。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 课件下载在我社主页“下载专区”。

说 明

四川省高教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教材由该专业主考学校四川师范大学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精神,组织专家、教授严格按照自学考试大纲的规定和标准编写,经四川省高教自考委员会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指导组负责人审定。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主要是为我省参加汉语语言文学本科段自学考试的同志提供适合自学特点的教材,以应急需。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教材征订环节,缩短发行周期,保证按时向考生提供所需教材。

这套教材与原使用的教材在内容、体例、标准上相同,考生可在这套教材和原使用的教材之间任选一种使用。

编 者

1993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巴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1
第二节 巴金的思想	20
第二章 《激流三部曲》	48
第一节 《激流三部曲》的构思、内容及 主题	48
第二节 《激流三部曲》的人物系列	61
第三节 《激流三部曲》的艺术成就	87
第三章 《憩园》、《第四病室》、《寒夜》	97
第一节 《憩园》	97
第二节 《第四病室》	105
第三节 《寒夜》	110
第四章 其他创作	131
第一节 中、长篇小说	131
第二节 巴金的短篇小说	156
第三节 巴金的散文	168
第五章 文艺思想与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及其 演变	181
第一节 文艺思想	181
第二节 巴金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及其特点	199

第三节 巴金小说的艺术技巧	219
---------------------	-----

第一章 概 述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从他 1927 年开始创作《灭亡》算起,至今已在文坛辛勤耕耘了六十多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他创作了中、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评论。巴金是我国新文艺运动的辛勤园丁。他担任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主编过《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书》、《译文丛书》。编辑过《水星》、《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呐喊》、《烽火》等刊物。担任过《文学月报》、《收获》的主编。通过这些丛书和刊物,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发表了不少进步作家的作品。巴金又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了高尔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王尔德等世界著名作家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巴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根据巴金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文学创作的准备期(1904~1927 年)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 1929 年发表中篇小说《灭亡》时的署名,也是他以后用得最多的笔名。他

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封建地主家庭。他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自巴金的高祖李介菴到四川，至巴金这一辈，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巴金出生的时候，正是家庭最兴旺的时候，三世同堂，“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是我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巴金：《我的幼年》）那时，正是他的祖父当家。

巴金的祖父叫李鏞，曾在清朝政府做过多年的官，巴金出世前，他已退隐归家。由于祖父的“精明能干”找了一大笔钱，买了许多田地，修了大公馆，成了成都北门一带屈指可数的大富家。他喜欢诗，自己刻印过一本诗集《秋棠山馆诗钞》送人，喜欢结交“名士”，喜爱收藏古玩字画，并与戏班子有往来。他结过两次婚，讨过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三女。晚年，一心想的是“五世同堂”，使这个大家庭永远一代一代兴旺发达下去。在巴金的印象中，祖父是一个既保守又顽固的老人。他惋惜清朝的覆灭，对子孙坚持着守旧的教育方法。在家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俨然是专制制度的化身。他在家里，受到大家的尊敬，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了解和爱戴。在他临死的前几年，看到不争气的“败家子弟”对他的欺骗，儿子们之间的互不相容的仇视，似乎已感到这个家庭的崩溃的必然，于是在发狂中死去。

巴金的二叔在清朝中过举。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装上海假辫子，在成都开办律师事务所，做了大律师。但这个留过学又做律师的人在家里却是严守封建礼教，道貌岸然。他让女儿缠脚，也让巴金的大嫂迁出城门外生小孩，以避“血光之灾”。巴金的三叔也曾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当过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前回到成都，过着做诗人、玩小旦的放荡生活。在家

庭的纠纷中，常常和老五一道对付长房，在儿子面前却是个专制暴君。巴金的五叔是第二个祖母唯一的孩子，从小获得父母宠爱，在阿谀奉承中长大，学会了无聊阔少爷的一切坏事：撒谎、骗人、偷钱、打牌作弊、调戏老妈子。父亲在世时，差不多花光了妻子的全部积蓄。父亲一死，很快荡尽产业，被妻儿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成了“惯偷”，后被抓进监狱，死在牢中。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一个性格温和宽厚、安分守己的人。他曾在川北广元当过两年知县，辛亥革命前夕辞官回成都，据说为官清正，当地还有许多人挽留他。回到成都，买了四十亩田。从此以后，他就以长子的身份帮助父亲管理这个大家庭。

巴金就是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除五岁时，他随父母住在广元的知县衙门内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外，直到“五四”以前都在这紧闭大门的深深院落里过着优裕而又禁锢的生活。在这个小天地里，他受到最初的生活教育。

给予幼年巴金最初影响的是他的母亲陈淑芬。这是一个贤惠慈爱的女性。巴金称她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先生”。她对人宽厚，对子女的教育几乎不用打骂的办法，总是耐心地、轻言细语地向孩子们解释种种事情。有一次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打骂了丫环香儿，母亲批评他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她们犯了过错你也应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培养了孩子们一种宽容厚道的泛爱精神。

母亲给孩子们这种立身处世规范的启蒙教育，成为了巴金后来走向进步道路的起点。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我的几个先生》）幼年的巴金把“爱一切人”作为衡量一切人和事的主要准则。因此，当他看到身边一些与“爱”相矛盾的景象时，便往往疑惑不解：

妹子出痘子，馋嘴的奶妈偷吃了不该吃的“发物”——新鲜黄瓜，为什么被温和的母亲发现以后，叫人用皮鞭抽了二十下，并被撵出了门？

为什么平时慈爱善良的父亲，在当知县坐堂时却板着阴沉的脸，用毒刑拷打犯人，甚至惩罚犯人跪抬盒，事后还要犯人叩头谢恩？

为什么会讲故事的杨嫂，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他们兄弟多年，但她生了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而且人们还期待她早死，以致使她无助地离开了人世，成了异乡鬼？

.....

这一切与爱一切人相违背的事实，使巴金幼小的心灵里不断萌生着对现实社会中种种问题的怀疑，他感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不合理的。

母亲的泛爱教育，使得巴金一开始就把“爱”和对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同情联系了起来。他在母亲的应允下，经常与家中的轿夫、仆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常常跑到马房里，躺在轿夫们的床上，听轿夫、仆人们诉说自己悲痛过去。他亲眼目睹了苦难的遭遇：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以后，像一捆干柴般地僵卧在大门外的石板上，凄凉地盖着一领破席；因为偷祖父的字画被撵出去的仆人周贵，沦落街头成为乞丐，

最后悲惨地死去；一个老轿夫因为被诬陷，说他偷窃，逼得走投无路，自缢身亡……这些悲剧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巴金幼小纯洁的心灵，他含着眼泪，心里燃起了火一般的反抗思想。他发誓不要做一个少爷，而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帮助他们的人。

与此同时，巴金从“下人”身上看到了正直的品德。尽管他们受尽煎熬，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他们仍然抱着一种执着的人生信仰。轿夫老周常常教导巴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巴金：《我的几个先生》）这些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话深深地铭刻在巴金的心中。他把仆人们当作自己的朋友，帮他们烧火，看他们打牌，而仆人们也没有把他当少爷看待。后来巴金曾经说过：“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成为跟我不能分离的东西。”（巴金：《〈将军集〉序一》）

巴金十岁时，母亲去世了。这对从小沉浸在母爱温馨中的巴金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感到悲哀和孤独。两年半以后，父亲又病故，更增加了他内心的沉重与空虚。于是整天醉心于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渐养成了沉郁倔强的性格和好思索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清了大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愈演愈烈，长辈们的专横、无耻和罪恶一幕一幕地表演着。他所亲近的一些青年，特别是女子，遭受礼教的折磨和凌迟，使他格外痛心。处于长房长孙地位，性格软弱的大哥协助家长掌管家务，他常常屈服于长辈的压力，忍受着非难

与攻击。由于祖父反对送子弟入新学校，巴金失去了进中学的机会，只能在家中跟表哥学英语。现实象沉重的石块，压制着渴望发展的巴金。他对自己所处的大家庭充满了厌恶、乃至憎恨的情绪。他恨“上人”的虚伪与做作，恨封建家庭的专制与残暴，恨耳闻目睹的压迫、欺凌与不义，恨一切恶势力和不合理现象，因为它们摧残着爱、阻碍着爱的实现。这种情绪奠定了巴金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基础。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扩展，新思想象潮水一般以不可遏止之势传到了巴金的故乡——僻远的四川成都，冲进了李家公馆的大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生周刊》等，传到了巴金兄弟们手中。巴金和他的哥哥们如饥似渴地读着上面的文章。那里面的每个字都象火花一般点燃了巴金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巴金。巴金觉得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常常在说他们自己想说而不会说的话。由各种不同倾向而汇聚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新思潮敲击着巴金的心灵，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的生命焕发出了崭新的青春与光彩。正如巴金后来所说：“‘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巴金：《觉醒与活动》）

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巴金有点张惶失措。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抓得到的新东西，他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他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他都恨。在“五四”彻底反帝反封建精神、追求科学与民主时代潮流冲击

下,在新思潮的启蒙下,巴金明白了不合理的现存制度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应当推翻它、改造它;明白了世界上有剥削者的资本家、地主和被剥削的工人、农民两个营垒;明白了自己的上辈有罪、自己不该像他们一样过寄生的生活,应该有新的生活,应该走新的路。

1920年9月,祖父死去半年以后,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一道进入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之下迈出的第一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渴望参加社会活动,投身社会革命。为了寻求指导,他向《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写信。但去信后却没有回音。他并不灰心,又向本地刊物《半月》编者写信,要求参加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组织适社。由此他认识了《半月》的编辑,成了半月社成员,做了《半月》的编辑。1921年5月,巴金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叫“均社”的团体。他和他的同伴们写文章、办刊物、散传单,同干涉、限制刊物发行的警厅检查员周旋。他以紧张忙碌的生活为乐,沉浸在幼稚而美好的梦幻之中。

巴金对有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关注,决心为改造社会的事业和理想而献身的志向为他以后走向文学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他当时参与的刊物、加入的团体、写的文章都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从斗争矛头和效果看,实际从事的是反封建、反礼教、反军阀的斗争,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

1923年5月,巴金怀着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忧愤,追求真理、光明,渴望自由解放,要求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行动的炽热的感情,冲破了囚牢般的家庭,离开了闭塞落后的四川。他和他的三哥一道来到了上海。巴金兄弟到上海后,只住了

很短一段时间，年底便赴南京考进了东南大学附中。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枪杀罢工工人，镇压工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使在南京读书的巴金无比激愤。几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借作品主人公之口倾诉了当时自己的感情：“我不愿再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我底血，我愿把它流出来。”“我恨不得这场决死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奴隶底生活，预备给人做枪靶子的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死去的太阳》）帝国主义的暴行，给巴金刺激太深，南京路上的鲜血使他激动得无法忍受，这些爆发式的语言集中地体现了他当时的痛苦和忧愤。

1925年暑假，巴金高中毕业后，离开南京北上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不料体检时查出自己患有肺病。他心灰意冷，未进考场，只在北京小住半月便返回上海。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流亡中国、为争取民主、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朝鲜革命者。以后巴金与他们互相通信交往，一直到他去法国前夕。

巴金在沪、宁求学和养病期间，继续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从事这方面的宣传活动。他联系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1925年初，他开始和旅居美国的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通信。高德曼回信称安其那主义理想“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并热情赞扬巴金“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的感情。”这使巴金极受鼓舞。为了探究无政府主义的和原理，巴金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论著《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以及其他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在《民钟》、《民众》、《学汇》等报刊

上发表了不少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文章。他还对法国、俄国革命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编写了《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等历史传记。在这些文章中,巴金开始用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来认识一些具体问题。

年轻的巴金由于未能投身到正在勃兴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去,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真切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他用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那种非科学的空想共产主义理想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希望以此来作为改造社会的“药方”,因而找不到一条如何实现祖国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正确道路。他把自己陷入了错误的泥潭和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苦闷彷徨中。

1927年初,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巴金离开祖国,从上海动身赴法国留学。他希望在法国通过经济学的研究,继续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原理,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巴金到达巴黎以后,住在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楼上。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就安葬在这幢公寓旁边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巴金景仰的伟人。巴金上午在寓所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在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补习法文,其余时间便拼命读书。他阅读了许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和其他研究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在陌生的异国,巴金感到寂寞、忧郁。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常常折磨着巴金。“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的生活,我想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象被刀

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从我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于是,巴金开始了小说创作。

巴金青年时期的生活和经历,受的影响和熏陶,对他性格的形成、信仰的确立、道路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生活和经历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文学创作的前期(1927~1937年)

1927年3月,巴金在法国开始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的写作。

初次来到巴黎的巴金,在陌生孤寂的环境里感到十分痛苦,于是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文字。他让自己的痛苦、寂寞和热情化为一行行的字留在纸上。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提起屠刀宰杀革命群众。消息传到法国,巴金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时,巴黎正在掀起一场援救沙珂和凡宰地的运动。沙珂和凡宰地都是意大利工人,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六年前被美国当局诬为盗窃杀人犯遭逮捕,并判了死刑。巴金读过凡宰地的自传,对他的经历情操十分钦佩,对他的理想信仰更为倾心。他曾怀着复杂的心情给死囚中的凡宰地写过一封长信。5月,巴金收到了凡宰地的复信,极为兴奋。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写了些小说片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金在巴黎的朋友增多,生活变得有生气了。为了阅读朋友借给他的书,巴金把他未完的小说暂时搁起来。夏初,巴金因养病移居玛伦河畔的小镇沙多——吉里(蒂埃里堡)。

不久，他收到了凡宰地的第二封来信，并得到了沙珂和凡宰地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里的电椅上的消息。他在愤怒和震惊中又写了小说的几章。以后，他接连写了《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党并不同情于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反共与反动》、《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法律外的大屠杀》、《莎珂与凡宰特之死》等短文，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发表，抗议国内蒋介石的大屠杀，抗议美国政府处死沙珂、凡宰地，声援惨遭杀戳的革命者。过后，他的时间被一些经济学的书占去了。为了研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翻译《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巴金集中精力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诸人的著作，他暂时忘却了写小说。

促使巴金写完这部小说的是大哥李尧枚从成都的来信。大哥在信中要求巴金在法国早日学成，以“扬名显亲”、“兴家立业”。为了使大哥理解自己，他找出旧稿，续写了几章，整理并重抄了全部小说，完成了《灭亡》的创作。

1928年8月，巴金把书稿寄往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意在自费印刷，送给他的大哥看。索非收到书稿后，却把它介绍给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1929年《小说月报》一期至四期连载了《灭亡》以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成为轰动当年文坛的一部作品。

巴金在他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这样说过：“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灭亡》作为巴金文学创作的起点，真实地写出了当时作家的孤寂、苦闷、矛盾、惶惑的心情，写出了自己认识的、了解的、向往的革命青年，反映了革命处在低潮时期